

# 古典精神分析的象征之争：基于结构视角的重述<sup>\*</sup>

霍传松 居 飞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象征问题在古典精神分析的理论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早期精神分析内部的分裂一定程度上和对待象征问题的态度有关。而从结构的视角来看,象征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象征、象征物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利用象征结构的划分,可将古典精神分析在象征问题上的争论作出理论上的统合,并在理论统合的基础上去研究象征法背后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古典精神分析;象征;象征结构;临床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4)03–0195–06

象征(symbol)作为一种意义表达的手段,很早就得到了人类的青睐与使用。黑格尔在《美学》中便将象征型艺术放在艺术类型的最早时期,并从古老的东方文明出发,探讨象征这一形式的重要意义(黑格尔,1979)。而将象征放于心理学与心理治疗的框架下加以考察,应归功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起源于对症状和梦的研究,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象征化的过程已经呈现在无意识思维中,梦在使用它”(Freud,2010)。伴随着对无意识中象征元素和象征过程的发现,精神分析学家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同时也反映了分析家(analyst)们对待心理治疗的不同态度(霍传松,居飞,2022)。由此,文章主要在于从结构的视角厘清象征问题在古典精神分析中的历史与争论,并基于此去探讨象征的临床意义。

## 1 象征问题的历史

弗洛伊德对“象征”一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此时他所使用的概念为“记忆象征(mnemic symbol)”,即在癔症(hysteria)中创伤经历的情感没有得到释放,而是处在一种被扼制的状态,这一扼制的情感被转换成癔症症状。癔症症状便是被压抑记忆的替代,故称为记忆象征(Freud,1955)。此时弗洛伊德对象征的使用并没有进行特殊的限定,一切由压抑所导致的替代性产物均可称为象征,其中的核心过程是移置(displacement)。

象征问题在精神分析学界的深入研究和梦有关,弗洛伊德1900年在《释梦》第一版中便探讨了

象征的问题,这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上:(1)对已有象征式释梦法的批判。在此弗洛伊德的批判并不是对“梦中象征具有固定意义”这一论断的根本否定,而是认为这些方法更多依靠的是释梦者的直觉和天赋,而非一套可以推而广之的科学理论。(2)象征化(symbolization)的机制不同于梦的形成机制。象征化的过程已经在无意识中完成,梦则使用这些象征元素来躲过审查机制(censorship)的制约作用。(3)典型梦的存在。弗洛伊德在此探讨了一些典型梦例,这些梦是超越于个体的,它们的方式、意义和来源在不同的个体间均具有一致性(Freud,2010)。弗洛伊德对象征问题这三个层面的论述奠定了精神分析象征研究和争论的基调。

从1909年开始,象征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单独领域,其任务是利用神话、传说、小说等类似的文化性产物作为支持材料,来分离和翻译某些心理元素(Petocz,1999)。在此过程中,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作出了具有争议性的贡献,他在拓展精神分析对象征符号理解的同时,也将弗洛伊德所拒斥的直觉方法重新引入了精神分析。“他对象征主义知识作出了贡献,在这一领域他比弗洛伊德有更多的直觉和天赋,在精神分析的早期阶段具有非常大的价值(Jones,1955)。由于斯特克尔在象征方面特殊的天赋,弗洛伊德接受琼斯(Ernest Jones)的建议,让他在1910年的纽伦堡精神分析大会上提议建立用于收集象征符号的委员会(Bos & Roazen, 2007)。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拉康思想发展研究”(19BZX094)。

通信作者:居飞, E-mail: jufei@tongji.edu.cn。

委员会成立后,斯特克尔对象征问题的回应便是 1911 年的著作《梦的语言》(Die Sprache des Traumes)。这本书延续弗洛伊德的探讨,对典型梦和象征进行分类,并用大量的章节论述死亡象征,“几乎每个梦都包括一个困惑的画面,而它在问‘死亡在哪?’”(Stekel,2012)。虽然斯特克尔在书中探讨了很多象征话题,但当时的弗洛伊德中心群体对他的贡献评价并不高(Bos & Groenendijk,2007),主要因为他对梦中象征的看法偏离了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体系,过度高估象征和梦显意(manifest content)的作用,走上直觉主义的道路。

但是斯特克尔的著作还是将精神分析的注意力抓到象征问题上来,在 1912 年到 1916 年这段时间内,精神分析内有大量象征理论的文章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荣格的《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费伦齐(Sandor Ferenczi)的《象征的个体发生学》、琼斯的《象征理论》。弗洛伊德也分别于 1914 年的《释梦》第四版和 1916 年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撰写专门论述象征主义的文章。对象征问题的争论,部分导致了荣格和弗洛伊德理论上的决裂,并形成以弗洛伊德、琼斯为代表的一派,和以荣格为代表的另一派。而对象征问题作出贡献的斯特克尔,终其一生,始终在想要回到弗洛伊德身边的路上。

## 2 象征之争的结构性论述

从意义表达的角度来看,象征关系的整体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即象征(symbol)、象征物(symbolized)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为了方便讨论,便分别对这三个部分进行考察。

### 2.1 象征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分为概念与音响形象,并表示在日常使用中,符号一般只指音响形象(索绪尔,1980)。象征关系与语言符号的划分具有类似性,日常生活中首先接触到的是象征,象征物是隐藏在后的。如鸽子象征着和平,和平之意是隐藏在鸽子之后的。当在精神分析中考察象征这一维度时,首先会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发现一个问题,即象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记忆象征的形成过程是和压抑联系在一起的,而压抑产生的原因是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冲突,所以症状作为一种象征,首先受制于个体生活事件的影响,这种象征是特殊性的。在典型梦中出现的象征,它们的运作和起源具有跨个体的一致性,所以是普遍性的。这一区别表明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象征,一种是经验

的、个体史的象征,另一种是先天的、种族性的象征。

仍以鸽子为例,当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时,这种象征关系是任意的,鸽子与和平并没有任何先天的联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是纯粹经验性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中“诺亚方舟”神话。而另一方面,鸽子作为一种鸟类,它也可以象征着男性生殖器,汉语和西语中均有用“鸟”来表达男性生殖器的习惯。郭沫若便在论“玄鸟生商”的传说中明确表明:“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生殖器的别名”(郭沫若,1982)。这种联系的建立是基于象征和象征物间固有特征的相似性,如赵国华便从表象和功能两个角度解释了鸟类是如何成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赵国华,1988)。

由此,可以将弗洛伊德的象征理论总结如下:当象征与症状相等同时,它是经验性的象征,象征与所表达的象征物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这种象征关系的建立依靠的是个体的经历与背后的情感;而当象征作为梦中的元素时,它是与古老思维和语言相联系的,对于个体来说,象征是先天的,象征关系的建立受制于固有特征或先天语言学联系。费伦齐、琼斯等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坚定地站在个体的立场上出发去回答这些问题,而荣格便更多地探讨那些对个体而言是先天的部分。

### 2.2 象征物

对于象征关系来说,象征是用以交流和表达的符号,象征物才是整个结构表达的意义所在。当询问一种象征关系到底是要说什么时,其实就是在探求象征物的性质。

从这一维度来探讨象征关系,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象征物是什么?即象征到底在表达什么。(2)这些象征物来自于何处?即象征物的发生学来源。

在之前所提的鸽子一例中可以看到,鸽子这一象征分别表达了“和平”和“阴茎”两种不同的含义,前者更偏抽象意,而后者更为具体。这也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争论之一,就以“蛇”这一经典的精神分析象征为例,弗洛伊德认为它是阴茎的象征,荣格认为它是抽象的性观念的象征,并引申出“蛇是智慧的象征”这一说法(Jones,2000)。由此可以看到,在弗洛伊德的象征理论中,象征物偏向于是具体事物或观念,而荣格认为象征物首先是抽象的观念,甚至是人类未知的事实。“象征…它意味着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模糊、未知和遮蔽的东西”(荣格,1988)。然

而,两人都需要去回应彼此的立场,因为正如在日常用语中发现的那样,象征物既有具体之物,也有抽象观念。

荣格通过象征和符号(sign)的划分来解决这一问题,“象征是对某种难以界定因此捉摸不透的事物的模糊的措辞,通常具有多种含义。而符号的含义总是固定的”(荣格,2011)。正如弗洛伊德赋予梦中象征的一个特点是意义的恒定性,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所谈的梦中象征并非真正的象征,而只是符号或比喻,在梦中梦到棍棒、钥匙开门等这些弗洛伊德式象征时,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性交比喻,是梦为了一定的目的而选择这些比喻。荣格通过这一划分,回答了他与弗洛伊德在象征物上的区分,弗洛伊德所谈的象征物是具体的、已知的、具有固定含义的,属于符号的范畴,而真正的象征物是抽象的、未知的,总是指向一个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即指向荣格后来所说的原型(archetype)。回到弗洛伊德的立场,琼斯对具体与抽象之争做出了回答。琼斯认为象征物有演化的过程,但它必定首先是具体的,最原初的象征过程是指一个具体的观念被另一个具体的观念所代表,而后来这一象征物以联想的方式与其他观念相联系,伴随着心智的发展,这些观念变得更加抽象,由此象征物也逐渐抽象化。“一个具体的观念,最初是用来象征另一个被压抑的具体观念,现在用来表达一个抽象的思想。因此,有一种常见但错误的观点认为,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示抽象的东西是一般象征的特点”(Jones,2000)。可以看到琼斯通过原初与继发的划分,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象征观念统合到一条发展线上,具体与抽象的争论并非像荣格所说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而是在心智成熟这一发展维度下的线性问题,象征物经历了从具体向抽象的发展过程,而精神分析所说的象征物,应该更原初和更具体。

上述争论主要集中在象征物的属性上,而对象征物具体是什么这一问题,古典精神分析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释梦》中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所提的象征物多为生殖器象征。但他所认为的象征物并非仅限于此,“梦中被赋予象征意义的事物范围并不广泛:整个人体、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出生、死亡、裸体——以及其他一些东西”(Freud,1961)。琼斯也认为“所有的象征都表征着关于自己和直系血亲的观念,或者表征着出生、爱和死亡的现象”(Jones,2000)。相较之,荣格认为象征物的主要内

容是未知的事实,其中主要便是原型,“原型是真正的、真实的象征…它们是真实地象征,完全是因为它们的意义模棱两可、隐隐约约,最终取之不尽”(荣格,2011)。对于原型,荣格又认为它们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多少种典型情境就有多少种原型存在。弗洛伊德和荣格对象征物的描述都涉及到原始经验这一问题,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站在个体及亲属关系这一领域,他们的核心模型是个体和家庭中的生活现象;而虽然荣格所说最主要的四种原型(即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以及自性)是存在于个体生活经验中的,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荣格的原型类似于深不可测的海洋,他对个体经验的描述是一种“自然(physis)”式的,趋向于先天确定的。就生活在原始氏族中的个体来说,自然和家庭何者为先、何者更为重要,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此就不详述了。

当从原始经验回到当下对象征物的探讨时,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象征物是如何传递的?为何这些原始经验的象征底蕴在现代也同样普遍且有效?对此,弗洛伊德表示:“象征关系具有种系发生学的意义。今天具有象征性关联的事物,很可能在原始时代通过某种概念或语言上的一致性结合在一起的,象征关系似乎就是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一致性的残余和标志”(Freud,2010)。他认为象征关系是无意识中的“古老遗产(archaic heritage)”,这种传递是通过概念和语言的一致性所带来的。荣格直接将这一经验的传递归到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本身便具有遗传性。“在荣格那里,象征的传递由一个完全不同的起源组成,它来自于集体,而主体对它缺乏经验,无法设想它的知识”(Settineri et al,2017)。可以看到,为了解决经验传递的问题,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视角中都采用了“先天遗传”这一视角,但幼儿早期经验事实与原始经验的一致性也可为这种传递提供解释,即幼儿驱力的客体、目的以及幼儿期长期依赖的事实在原始时期和当下是一致的,也正是心智结构和由生物属性所导致的事实经验的一致性,使得象征物的属性和内容得以传递至今。

### 2.3 象征与象征物的关系

在探讨完象征和象征物这两部分后,需要了解在整体的象征结构中,两者间的关系。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为何会有“象征关系”这一现象;在此基础上,象征和象征物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一问题才

能得以回答。最后,需要探讨象征和象征物在象征结构中何者更为重要。

在为何会有象征关系这一问题上,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达成了共识,即象征产生于等同。原始思维的倾向之一便是将不同的事物相等同,荣格引用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的“神秘参与(mystical participation)”来形容这种倾向。但在对等同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回答上,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异。荣格和西尔贝雷站在同一立场上,认为象征关系的产生来源于心智能力的不足。西尔贝雷认为这种不足是统觉(apperception)能力的不足,荣格认为是知觉缺陷所导致的观念清晰性降低。这种立场站在进化论和复演论的基础上,将象征视作心智缺陷的产物,它忽略了象征作为一种心智现象的运作动力和机制。琼斯站在精神分析学的立场上,用弗洛伊德的“快乐-痛苦原则”和“现实原则”对象征关系的发生进行了解释。简而言之,受“快乐-痛苦原则”和“现实原则”调控的心智倾向于将经验的相似之处同化到已有的观念之中(Jones, 2000)。这样他便叙述了象征得以产生的心理动力和机制,使其脱离纯粹的先天能力理论,象征和象征物之间等同关系的建立基于的是个体心智的惰性倾向。当然前提是象征关系中的两者对于个体而言,有可以相等同的共同因素、特质或条件。

最后,在象征结构中何者更为重要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争议。首先,从数量上来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弗洛伊德和琼斯等人认为象征物仅停留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而象征可以在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得到创造,所以象征的数量远大于象征物的数量;而荣格认为“只要象征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就是对不能以任何其他或更好的方式描述的东西的表达…一旦意义从它身上诞生,找到了比迄今为止所接受的象征更好地表述所寻求、期望或预言的东西的表达方式,那么这个象征就死了,也就是说,它只拥有历史意义”(Jung, 2016)。就活的象征、真正的象征而言,象征物的数量大于象征的数量,在文化领域中所遇到大量的象征只具有历史意义。从荣格对象征的探讨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象征关系中是一个象征物在等待它恰当的象征。其次,从优先性的角度来看,无疑在弗洛伊德那里,象征关系的重要性由无意识所彰显,象征是无意识的产物;而荣格认为“一个事物是否是一个象征,主要取决于观察意识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将给定的事

实看作是未知事物的表达”(Jung, 2016),他补充弗洛伊德的观念,强调意识在象征关系中的重要性,象征关系的诞生是无意识和意识的综合作用。

由此,在经历象征的结构剖析后,可以看到,在古典精神分析中,争论主要集中在象征的特殊性-普遍性,象征物的属性以及象征关系如何形成等问题上。当以结构的视角进行回溯后,古典时期的争论其实核心就是象征结构的三个维度,从结构的视角对象征关系进行重述,可以对象征问题做出一定的统合,并由此进入到对象征临床效用的探讨中。

### 3 象征的临床应用

#### 3.1 结构视角下象征的临床位置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象征关系可以放在“象征/象征物”这一象征结构内加以考察,但当以结构的视角回到精神分析的临床时便会遇到一些问题,如象征作为临床方法的位置何在?象征关系有其自身的结构,那么临床中个体与象征的关系为何?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体在象征的位置上是沉默的,其临床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

象征方法的临床应用首先是和自由联想结合在一起,在释梦过程中,“若梦中内容需要从象征角度解释,只能采用一种联合的策略:一方面依靠梦者的联想,另一方面用释梦者的象征知识弥补梦者联想的不足”(Freud, 2010)。但无论如何,在精神分析中,病人的自由联想必须处于首要位置,象征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将这一问题带回到对象征结构的探讨中可以发现,虽然整体的象征结构中并没有个体的存在,但这一结构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人才能得以表达;虽然象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恒定或普遍的意义,但对临床中某一个体所用象征具体表达的象征物为何,必须得在病人自身的心智运作中得以考察。这一点无论在精神分析还是在分析心理学中,均得到了承认。甚至像斯特克尔虽然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对待象征采用的是直觉性态度,但在心理治疗的设置中面对病人时,他并不会将一个预先存在的象征等同物强加给病人,而是将这象征带入到与病人的治疗性对话当中去,他强调象征含义的个体化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Timms, 2013)。荣格的“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也具有这一个体化的内涵。积极想象指向的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这一方法借由刻意的专注从而引发一系列个人的幻想,在积极想象中,病人被赋予的任务便是沉思对他非常有

意义的幻想片段,直到幻想所根植的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有关材料变得直观起来(荣格,2011)。可以看到,虽然弗洛伊德、荣格与斯特克尔三人在对待象征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站在临床的角度,三人均保留了“尊重病人自身的心智运作”这一原则。

正如奥格登(Thomas Ogden)提出“心理深层结构”,用以指心智沿着特定线路组织经验,并为这些经验赋予意义的先天倾向(奥格登,2017),在象征这一问题上,首要的也是其组织形式。由此,当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中遇到象征元素时,首先需要利用的并非分析家对象征的知识,而是要考察病人的联想方式以及象征元素的表现形式,如象征元素是如何被他的联想所带出来的,象征元素是如何嵌入在病人整个联想链中的,象征为何在这一位置上来组织病人的无意识和经验。其次才是分析家用象征本身的结构知识来补全病人在这一位置上的缺失。

### 3.2 象征争论的临床意义

在象征结构三元素上的争论,也使得在具体的临床工作中,不同的分析家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首先,在对待象征性解释的态度上,弗洛伊德十分严谨,他认为通常在病人联想无法继续,或病人还差一步就能到达分析家所需解释的位置时,才会对病人做出象征性的解释。斯特克尔在这方面更加主动,他认为弗洛伊德对待解释的态度会导致“过度治疗”,他转而采用更加简短的精神分析式治疗,更加关注病人的梦的显意,更加积极地进行象征性解释。而荣格的象征解释一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原型”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代表,另一方面,他的积极想象相信无意识自身的活力,通过让病人想象各种象征型意象而在意识层面去体验这些“原型”。其次,从象征性解释的指向来看,弗洛伊德的解释更多为具体的性观念和亲属观念,由此导致他在临床上的指向更偏考古学回溯;而正如恩克尔(Henrik Enckell)所说,精神分析中同时存在着考古学和目的论两种模式(Enckell,2010)。后者是荣格所认为象征性解释的指向,更多地指向前瞻性、开放性的部分。由此,分析家象征性解释中固然需要包含和病人生活经验相关的回溯性部分,但同时解释也需要含有超出病人已有经验结构的开放性部分,正是这两者在象征性解释中的重合,重新打开了病人的联想和新的可能性。最后,从象征与象征物的关系角度出发,正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差异所揭示的,临床中重要的并非意识和无意识何者具有优先性的问题,

而在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自由联想和积极想象都是使意识和无意识可以更好地进行互动的方法,也就是精神分析一贯的原则,即“将无意识意识化”。

总而言之,在临床中无论对象征结构有何种争议,都必须让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他由象征所唤起的情感和观念,分析家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积极或缓慢的姿态去使用解释这一工具,并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和语境范围内等待象征意义的浮现。

### 4 总结和展望

回到结论上,人类为什么需要象征,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能用语言说,而必须通过象征来表达。无疑,象征最早就是和图腾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是图腾,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其解释为社会的象征(涂尔干,2011),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图腾是家庭的象征,是原父的象征(弗洛伊德,2005)。就如这一争论所指示的,当对象征问题进行回溯时,面对的是一个接近起源性的问题,对于人类而言,最早的关系是家庭还是自然,人类最原始的经验组织形式是来自于家庭内的互动还是与自然的互动,这一问题需要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努力。古典精神分析对象征关系的探讨,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要捋清这一疑问,结构的视角也只是一系统性的尝试,它的完善和发展还受到中国这一独特历史经验的考验。结构常以其普遍性、不变性以及稳定性相称(高宣扬,2017),当面对中国这一饱含象征元素的文化时,象征结构是否还能维持它的适用性,这一点,还有待精神分析本土化的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爱弥儿·涂尔干.(201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务印书馆.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沫若.(198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高宣扬.(2017).结构主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黑格尔.(1979).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霍传松,居飞.(2022).象征在精神分析中的发展.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4),774-777,788.
- 卡尔·荣格.(1988).人类及其象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2011).转化的象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2011).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005). 图腾与禁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托马斯·H·奥格登. (2017). 心灵的母体.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国华. (1988). 生殖崇拜文化略论. *中国社会科学*, (1), 131–156.
- Bos, J., & Roazen, P. (2007). Acts of betrayal. Reading the letters of Wilhelm Stekel to Sigmund Freud.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16(2), 68–80.
- Bos, J., & Groenendijk, L. (2007). *The self – marginalization of Wilhelm Stekel: Freudian circles inside and out*.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Enckell, H. (2010). Reflection in psychoanalysis: On symbols and metapho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5), 1093–1114.
- Freud, S. (195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61).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 Freud, S. (201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New York: Basic Books.
- Jones, E. (1955). *Sigmund Freud: Life and works*, 3vol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 Jones, E. (2000).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Books.
- Jung, C. (2016). *Psychological types*. London: Routledge.
- Petocz, A. (1999). *Freud, psychoanalysis and symbo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kel, W. (2012). *Sex and dreams: The language of dreams*. Hong Kong: Forgotten Books.
- Settinieri, S., Merlo, E. M., Turiaco, F., & Mento, C. (2017). The symbol theory in S. Freud, CG Jung and CS Peirce.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2).
- Timms, E. (2013). Wilhelm Stekel's dialogue with Sigmund Freud: The case for brief therapy and the symbolism of dreams.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5(2), 207–220.

## The Controversy of Symbolism in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A Restatement based on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Huo Chuansong    Ju 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symbols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Review of the history shows that the split within early psychoanalysis was to some extent related to the attitude toward symbolism. And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the structure of symbol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symbol, symboli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divi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ymbols allows for a theoretical unification of the classical psychoanalytic debate on symbolism and a further study of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ymbolism.

**Key words:** classic psychoanalysis; symbol; the structure of symbol; clinical methodology